

李任仁先生遗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文化供應社股份有限公司全體人員留影紀念
民國卅一年
三月廿九日

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桂林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毕业典礼摄影



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照片说明

前排坐者（自右至左）孟秋江（国际新闻社）邵宗汉（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李任仁（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陈纯粹（中央社）刘季平（生活教育社）第七人盖成（广西大学教授）

二排站立者：立正中者陈农菽（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其右手第一人汪止豪（伤兵之友社）第二人仲期森（扫荡报）

1966年在南宁国际旅行社李任仁和夫人何若真会见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时留影



目　录

封三题字……莫适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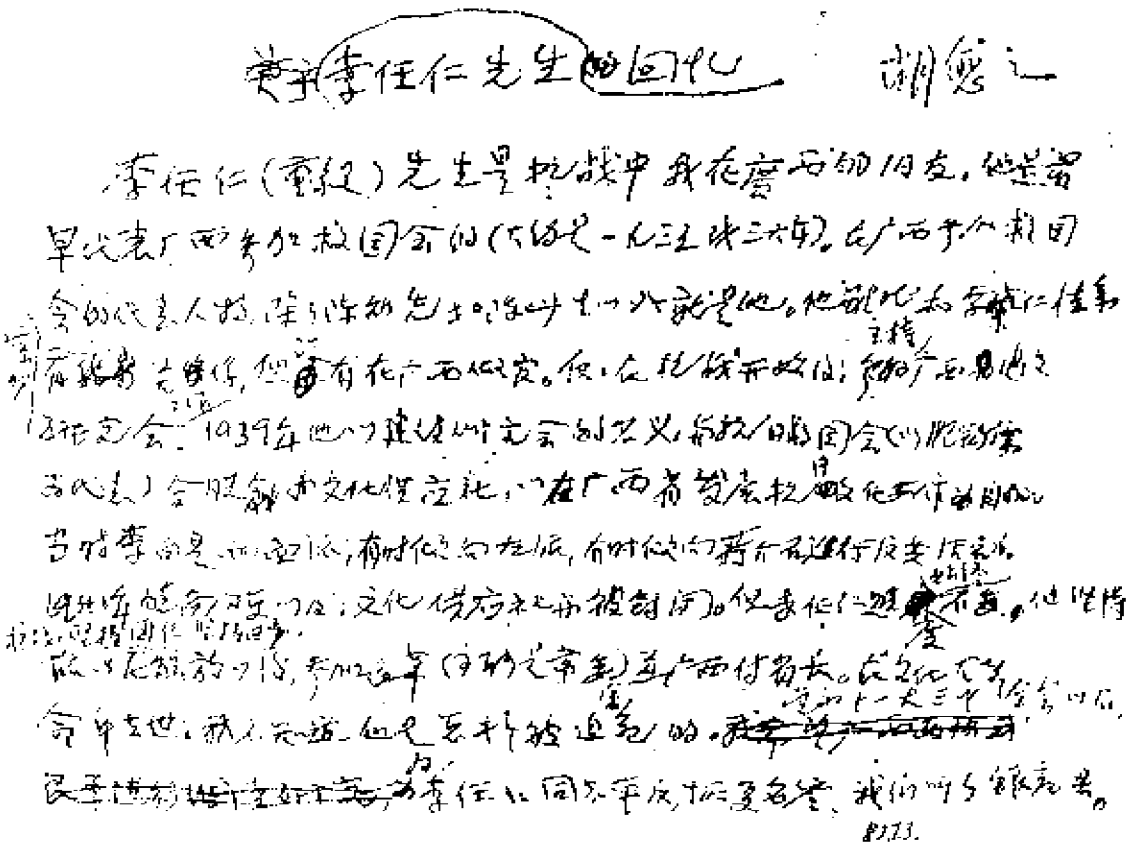
回忆李任仁先生……胡愈之（1）
回忆李任仁先生二三事……夏　衍（2）
缅怀李重毅先生……千家驹（4）
我所知道的重老二三事……梁漱溟（7）
忆重老……夏孟辉（9）
回忆李任仁同志……万仲文（13）
缅怀李任仁同志……何若真遗作（26）
“历史行程总向前”
　纪念李任仁先生对广西教育事业的贡献……汤有雁（30）
李任仁先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韦瑞森（34）
回忆李任仁同志……冯　璞（40）
回忆李重老……李　徽（44）
李任仁老师革命史实片断……章　毅（50）
在李重老身边的片断回忆……文澜　超寰（54）
忆重老二三事……学　人（58）
李任仁先生美德懿行闻见录……李朋章（60）
李任仁——进步事业的支持者……陈大文（64）
重毅伯伯点滴事迹……李明征（71）
李任仁先生二三事……宋厚初（79）
我跟随李任仁先生……秦绍雄（85）
回忆我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李海楼（92）
先父李任仁年谱简编……李海楼（9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任仁遗稿

诗十五首……李任仁（110）
孙中山莅桂和桂林中山纪念塔的建成……李任仁（113）
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李任仁（118）
给陈劭先先生的一封信……李任仁（125）

编后话……编　者（127）



悼李任仁先生

谢冰心

李任仁（重毅）先生是抗战中我在广西的旧友。他是最早代表广西参加救国会的（大约是一九三五或三六年）。在广西参加救国会代表人物，除了陈劭先和陈此生以外就是他。他虽然和桂系有密切关系，但没有在广西做官。仅仅在抗战开始后，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工作。1939年他以建设研究会的名义，与抗日救国会（以沈钧儒为代表）合股创办文化供应社，以在广西省发展抗日文化工作为目的。当时李、白是两面派，有时倾向左派，有时倾向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文化供应社亦被封闭。但李任仁态度始终不变，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所以在解放以后，参加民革（可能是常委）并广西副省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被迫害死的。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为李任仁同志平反，恢复名誉，我们听了很高兴。

1983.7.3.

回忆李任仁先生二三事

夏衍

编者按：今年五月间，本刊为了出版李任仁先生史料，派人到北京访问了夏衍同志。回来后将夏衍同志去年在《羊城晚报》连载的《记者生涯的回忆》中有关李任仁先生的部分节录下来，寄给夏衍同志，征得夏衍同志同意，在此发表。

我从广州撤退到桂林，李克农同志安排李任仁先生陪我去见黄旭初。

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一般说来把桂林叫做“文化城”看来是可以当之无愧的，除了当时李、白、黄的态度比较开明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广西在我们到来之前，在文化新闻、出版、文艺等方面，进步力量都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基础，其中最突出的，是以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先生为主任的一个颇有声势的“广西建设研究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会长是李宗仁，副会长是白崇禧、黄旭初，常务主任李任仁是白崇禧的老师，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李达、胡愈之、欧阳予倩、杨东莼、张志让、姜君辰、千家驹、范长江等知名人士。（《救亡日报》）迁桂之后，我也接到了一份“聘书”，请我当了委员）。这个组织只出一份叫《广西建设》的杂志，不搞什么抛头露面的政治活动，但它实际不仅是桂系对外炫耀进步的一块金字招牌和各方政治势力联系的纽带，而且是李、白、黄的一个最有力的智囊集体。这个组织看起来“名士如林”，而实际主持大计的是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等，这些人在国民党看来都是不折不扣的李、白“嫡系”，只要蒋桂不正式撕破脸，CC也好，军统也好，要对这些人下毒手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李白集团通过这个机构支持了当时从外省迁来的进步组织和

个人；必要时，也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和中共及其外围保持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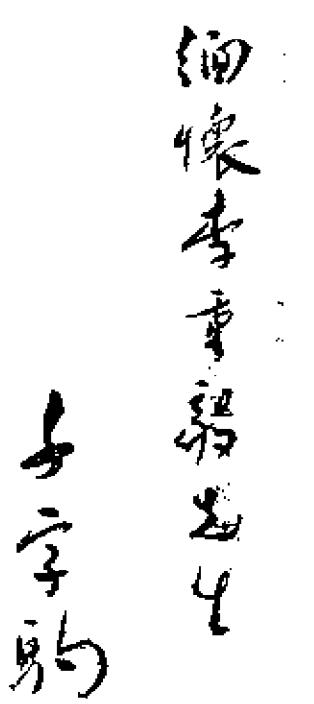
皖南事变后，一天李克农同志来通知我要撤退了，李克农同志说："分几步走，第一步是你先走，留下的事由林林、张尔华负责，只要国民党一天不来封门，我们就继续出版。但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看来也是保不住了，所以整个进步文化界人士，都得作好妥善的安排，他已经向南方局请示，建议凡有公开职业，可以得到广西方面保护者（如广西干校的教职员），都照旧坚持岗位，一些名气较大的文艺界人士，色彩不太明显者，也可以暂时留在桂林，《救亡日报》的骨干（印刷厂工人，南方出版社职员除外）等到报社被封后一律撤往香港。克农同志还说："这些事都可以由我处理，明天你得去找黄旭初，坦率地告诉他《救亡日报》和你们目前处境，并向他表示，为了'好来好去'，希望得到他的帮助，订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我说，假如他避而不见，怎么办？李说："这可以放心，我已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还是任老用他的汽车送我来的。"

周总理说：

凡是在我党困难时期帮我们忙的人，革命成功后不要忘记他们。

录自夏衍同志在1981年羊城晚报上发表的《补遗和更正》一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重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被迫害逝世，听到这个消息，不禁惆怅久之！重毅先生是广西政界的元老，德高望重，亦是广西进步民主派的一面旗帜。他是白崇禧小学时的老师，凭着他与白崇禧的师生关系，在新桂系中有崇高的威望与地位。他一贯思想进步，好与进步文化界来往，掩护过不少民主进步人士，（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在广西做了许多好事。他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有贡献的人物，是国民党真正的左派。我第一次见到重毅先生是在一九三三年。当时北平社会调查所应广西当局之邀，派了我和吴半农、韩德章等三人去广西调查经济。在一次白崇禧、黄旭初设宴的宴会上见到重毅先生，但没有深谈。一九三六年冬我因救国会“七君子”事件的牵连，离开南京，去广西避难，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当时在西大任教的还有陈望道、邓初民、熊得山诸同志，当时西大进步教授与顽固派的斗争是很尖锐的。西大进步教授的后台就是重毅先生。那时以官僚朱佛定（西大秘书长、西大校长由省主席黄旭初兼，秘书长代行校长职权）为首的顽固分子，想把陈望道同志挤走，陈已提出辞职，整装待发，准备回上海去。黄旭初以我新来西大任教，他还不很了解我的政治立场，遂征询我对陈望道辞职的意见。我说“陈是国内知名的学者，各大学想要延聘他，都求之不得，怎么可以让他走呢？”黄听了我的话，遂恳切挽留望道先生，并动员李宗仁出面挽留，陈因之打消了辞意。事后望道同志告诉我说，重毅先生早就向桂省当局进言，说这些进步教授因不满南京反动当局之所为，来到广西，是广西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是广西的政治资本，应多方罗致才是。重毅先生是桂林会仙乡人离桂林有几十里路，

许多进步教授都被邀请到他家里住过。

抗战开始，广西成立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会的核心人物，一个是李重毅，一个是陈劭先。建设研究会是受到广西当局支持的一个团结各方面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上好象一个学术团体，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组织。会长李宗仁，副会长白崇禧、黄旭初；常务委员三人即李重毅、陈劭先、黄同仇。黄同仇是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顽固分子，后投靠C.C.。黄同仇曾一再攻击研究会中的进步分子，其阴谋未得逞，就不再过问研究会的事，到安徽做官去了。事实上研究会的工作由李、陈两先生主持。桂林在抗战时期有文化城之称，武汉撤退后。许多进步文化人都聚集在桂林，如胡愈之、夏衍、范长江、张志让、杨东莼、李四光、陈此生、千家驹等，而建设研究会是文化人集会的中心。陈劭先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一贯反蒋，与李宗仁交谊甚笃，他与重毅先生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他们两人做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有利于抗战、有利于进步事业的工作。这是人众周知的。凡是到过广西的进步朋友，没有一个不认识重毅先生，没有一个不得到他的关怀。他还掩护过许多进步朋友，举几件显著的例子来说，皖南事变以后，重毅先生掩护过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的撤退。当韬奋从重庆间道来到桂林，拟去香港时，国民党特务追踪而至，是重毅先生把韬奋保护起来，买了飞机票送他去香港。又当马君武接长广西大学以后，在一次广西省政府的扩大会议上，马君武攻击我是共产党，也是重毅先生起来为我辩护，质问马君武，说千家驹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千家驹把老母妻子都带到桂林来定居了，有这样的共产党吗？（请读者注意，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共产党就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可以杀头的，并非如今天“共产党”意味着光荣称号）。象这样掩护进步文化人和地下党员的事，不一而足，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起来。其实，在形式上我与重毅先生并无密切的来往，也可以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吧，他为我与马君武在省府扩大会上舌战的事，我

当时根本不知道，事后亦未告诉过我，我还是解放以后才知道的。重毅先生老成持重，象一个老夫子，但他是有原则的，凡进步的事业和进步的朋友，他无不大力支持，凡是不利于进步的事业或顽固分子，即使是他的老相识，他也坚持反对。以他在广西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与桂系的密切关系，谁也不会怀疑他有政治野心或别有所图。重毅先生正凭着他在广西政界的特殊地位，为进步文化事业和进步人士做了许多好事。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沾沾自喜，他是一位忠厚长者，是广西进步力量的一面旗子。

重毅先生对广西民主革命运动和进步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他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支持“广西宪政促进会”的成立；支持“广西文化供应社”的创设以及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广西和平运动。他的丰功伟绩，卓越贡献，历史自有公论。我相信，写广西现代史的人，是决不会忘记重毅先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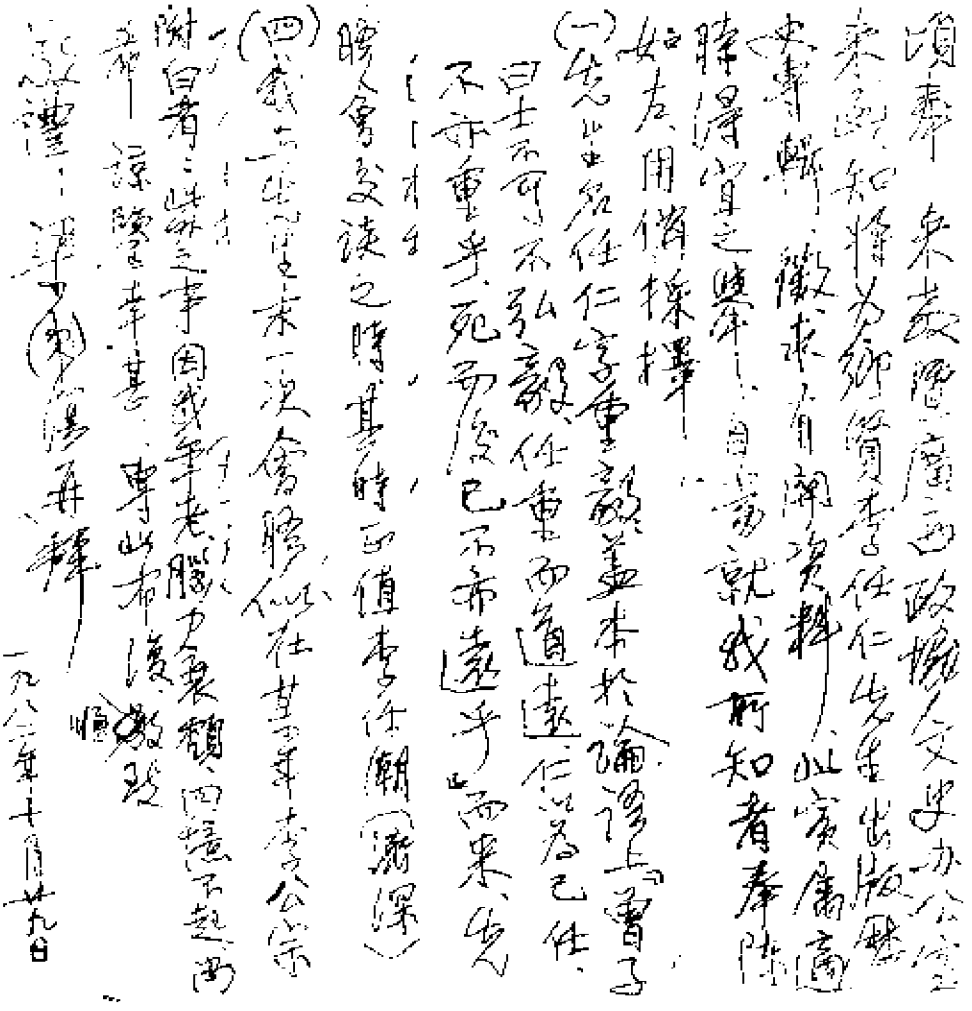
然而象重毅先生这样一位忠厚长者，这样一位对广西进步文化教育事业、对民主革命运动做出过贡献的人，竟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他虽然是在大水中淹死的，事实上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是决不会采取这种变相自杀的手段的。重毅先生一生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心耿耿，作为共产党的肝胆相照的诤友，竟难免于文革中造反派的毒手，真是公理何存，天道宁论！

党的十一大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重毅先生的冤案早已得到了平反；足见公道自在人心。现在党中央正大力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党对民主人士的政策，历史是最公正的，那一小撮造反派小丑们已被押上人民审判的舞台，而真正对人民革命事业做出过贡献的人将浩气长存，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业绩。重毅先生地下有知，亦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1983.6.27日 北京

我所知道的重老二三事

梁漱溟



頃奉来教暨广西政协文史办公室来函，知将为乡贤李任仁先生出版历史专辑，征求有关资料，此实属适时得宜之举，自当就

我所知者奉陈如左，用备采择。

（一）先生名任仁、字重毅，盖本于论语上“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而来，先生在政治活动上既忠孙中山先生之革命路线，对于后来蒋介石的国民党来说，便属左派了。

（二）漱溟承先生不弃，雅相交好，盖当1941年，我在香港创办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宣言后，因香港陷落日寇之手，偕同陈此生兄返回桂林，首尾留居三年，是我与先生经常晤会交谈之时，其时正值李任潮（济深）先生任职中央军委驻桂办公厅主任，彼此在政治上立场意见十分相合，乃时相过从，聚晤地点多在八桂厅陈劭先先生处。

（三）日寇侵华失败投降后，我做为民盟代表参加重庆的政治协商会议而离开贺县八步镇之时，曾有一封信邮致重毅先生告别。（意谓聚会将少了。）

（四）我与先生末一次会晤似在某年李公宗仁（德邻）从美国返国到北京，党政方面安排各党派和各方人士表示欢迎的一次盛会上，重毅先生特被邀请，亦来京参加，乃得把晤的。

附白者：此外之事因我年老（九十岁）脑力衰颓，回忆不起，尚希谅鉴幸甚！专此布复，顺致

敬礼！

梁漱溟再拜

一九八二年十月廿九日

忆 重 老

夏孟辉

七月初在武汉医二院治病中，接苏州家里转来广西政协文史办的信，要我选写一篇有关“李任仁先生史料”，因目前的条件和时间，只能写出几点时常在我脑海中盘旋的印象，希望这几笔简单的速写也能有助于对重老其人其事的认识与回忆。

李任仁先生号重毅，我是1937年冬天在桂林认识他老人家的，距今已46年，那时正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弥天烽火，遍地狼烟，中华民族全民奋起，为驱逐入侵我神圣领土的日本法西斯强盗而拼命搏斗的时候。我刚从日本回来，应友人之约，取道香港到桂林参加抗战。到桂不久就认识了他老人家，其时我还年轻，只有28岁，李先生已是国内知名之士，大家为了对他的尊敬和爱戴，“重老”的称谓已成为人们的习惯。照理当时我们年龄相差很大，地位也有一定距离，但由于重老的简朴平易，和蔼可亲，尤其对当前政治的腐败有共同的担心，对团结、抗战、民主有一致的见解，因此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接着我参加了广西建设研究会政治、文化两部工作，后来又兼任了编译室主任，负责几种杂志等的编辑出版工作。当时建设研究会，日常主持会务领导工作的是两位常务委员，李重老和陈劭老（劭先），而建设研究会内部的情况也和社会上一样，各种思想各种势力的斗争十分复杂，但由于李、陈两位的社会地位，

领导才能，以及他们和颇有雄心问鼎中原与蒋介石争一日之长的广西派头头李、白等的私谊，所以虽在十分困难的环境之下，始终保持了进步力量的主导地位。因此也更引起了蒋方的注意与歧视，建设研究会被目为中共外围组织，曾派朱家骅、徐恩曾等先后来桂掌握情况图谋对付，结果除了通过邮电检查机关对建设研究会发行到省外的刊物任意扣留外，别无多大办法，但内部斗争却也随着时势的变迁而更形复杂。例如该会当时出版的刊物之中，有一种叫《时论分析》，分成“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栏，每期在每一栏目中选出若干当时大家所关心的题目，以不参加任何主见的形式摘录各党各派以及各个方面对本问题看法的言论，目的在使读者于短时间内可以了解全国各方面对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其中延安方面的意见，因在反动的政治势力明里暗里的破坏之下，一般不易看到，也就最受欢迎，当时我们暗中掌握的编辑方针，也以多引用这方面的材料，帮助读者多了解到一些不易了解到的情况，以便不受一方蒙蔽，更好地判断是非，作出自己的结论。但由于分栏编辑的思想情况和立场不同，取材摘引就不一样，因之在最后汇编审稿，往往争论不休，大费周折，但由于李、陈二老的全力周旋，始终维护了编辑方针没有受到大的损害。会内复杂的斗争是很多的，这里只是略举一例，藉以说明在那种形势之下，维护每一进步事业，保卫每一种进步行为都非常不容易，于此可见，重老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很卓越的。

还有一件事在抗战时期也一时颇为轰动的。在重庆的国民参政会、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为实施宪政和民主的问题，同当时当权的国民党开展了剧烈的斗争，有一次参政会上，通过了一个中共参政员董必武等提出的由各省参议会发起组织“宪政期成会”以期更多地听取各方意见，促使早日实现宪政的提案。其时重老是广西省参议会议长，得到消息立即发动，并利用建设研究会的人力组成各种座谈会，编印宪法参考资料，有一次并由我主持在桂

林国际广播电台邀集在桂法学界人士组织座谈会，对重庆国民党提出的“五五宪草”提出了不少否定的意见，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蒋中央颇为震怒和头痛。

在整个抗战时期，重老在中共的号召和启迪之下，做了大量有利于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事业，他为广西引进了各方面许多进步的人才，使桂林在整个抗战时期文化工作始终搞得生气勃勃，一直保持了后方文化名城的荣誉，虽然也有抗战时期的客观原因，但重老在这方面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当蒋特迫害摧残生活书店等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时，重老挺身而出，用组织“广西文化供应社”的名义保护了这些单位的资产，对各该单位的工作同志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对党的在桂地下工作的维护，对不少进步人士安全的保护，重老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重老一生进步事业最得力的助手和合作者，是陈此生同志，他们的关系一直很密切，抗战时期他们俩家在桂林风洞山附近的漓江边盖了几间小平房，文化界著名人士茅盾夫妇和革命前辈胥凝老人等都先后在他们家里住过一个时候。

重老很有风趣，非常爱朋友，抗战胜利后一个时候我住在南京，他到南京时总来我家聊天，有时还同去夫子庙上小馆子。

上海解放后重老就在北京来信约我重返广西工作，当时我因黄任老（炎培）有约在先，未能去成。

1951年我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土改队，去广西搞土改，同去的有千家驹、阳翰笙、田汉等，都是在广西时和重老很熟的人，他老人家当时是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我们一到南宁，重老就赶到我们住处来探望，第二天我们几个人到他家回访，他家住在一座傍水的小院子里，环境十分幽静，旧友重逢，论今忆昔，畅谈甚欢！在闲谈中重老了解到我们这次同来的有轻工业部造纸工程师，马上就告诉省人民政府负责工业的同志，第二天就把我和那位工程师接去，征求对广西造纸工业的意见。这些地方可以看出重老是如何重视人才关怀国家建设啊！万没想到十年浩劫中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